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委员建言

产业升级

# 全国政协常委建言：围绕“实”字下功夫

本报记者 李元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日前，在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常委们积极建言。

## 贾楠：“以实助实”促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表示，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在数实融合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实体经济基础和数字技术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这些企业立足产业探索数字化转型新模式，坚持数智化布局，在实现了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同时，赋能传统制造业和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转型，成为助推千行百业降本增效的基础设施型服务商，有效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型实体企业是数实融合的典型代表，为加速产业数字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在贾楠看来，新型实体企业具有以下特点：实体性，具备实体经济基因和属性，拥有实体产业基础，直接承担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任务；科技性，具有创新的数字技术和能力及丰富的场景化应用，依托数据和技术禀赋优势，创新自身业务模式、改善自身经营效率，并通过大量扎实实践，成为相关领域数字化升级的表率；以实助实，在工业生产、商品流通、信息通信、民生保障等领域，作为基础设施运营商，建设、运营相关新型基础设施，建立技术赋能、普惠共享的生态底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独行快，众行远。”贾楠举例说，如京东积极推进货网、仓网、云网的三网联通，促进供应链与产业链的双链融合，有效提升产业效率，把产业链升级为价值链。通过供应链与中小企业在货网、仓网、云网上进行深度协同，帮助中小企业打破供应链“孤岛”实现“三网通”、补齐短板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达到

“补链”的效果。实践证明，实体经济始终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新型实体企业在数字经济大潮下积极探索并创新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供应链能力，并始终坚持从实体中来、到实体中去，在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为助力和促进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贡献力量。

贾楠为此建议，新型实体企业应进一步基于对供应链全环节的高效协调与管控的数字技术能力，开放服务系统，助力上下游的传统实体企业，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降低企业整体成本，提高传统实体企业的效率和利润空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借鉴新型实体企业经验，针对实体企业的市场营销、原材料和资产的采购、管理和使用权的分离等问题，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充分发挥其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加速实体经济生产和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 孙继业：加快产业转型 完善产业体系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孙继业认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经济发展由过去的要素投入为主，向要素投入和技术创新共同驱动转变，盘活低效资源，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重要驱动力。

“产业转型，重点抓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在控制好总量的基础上，着重增加产品附加值，做好减污降碳和节能减排工作。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提升附加值。”孙继业表示，借鉴山东省优选整合的11条标志性产业链，精选头部企业，突破协同制造难点堵点，拉动上下游企业加快技改进度；放大细分领域标杆引领作用，从41个工业大类中各选一批企业，实施流程再造，打造涵盖技改组件、收益分析、合同样本等全流程技改“范式”，增强企业愿改、会改的意愿和能力。开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行动，对企业所属创新平台开展技术引进、设备更新等，予以重点支持。“数字转型，要着力强化数字赋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工业互联网+绿色制造’工程，深化工业互联网技术在‘两高’领域的应用，加快铸造、

## 发展安全

# 上山下海助小微 为数字中国发展筑牢安全底座

周鸿祎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基本建成，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持续提升，网信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加快”“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让我备受鼓舞，同时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安全在中国发生了重大、显著的变化，依法治网已成为依法治国的时代课题。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300余项国家标准陆续出台，构建了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网络安全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可以说，这10年来，中国已经从网络安全的追随者变为引领者。

特别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刚刚审议通过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我国在网络治理方式中体现出的中国智慧——一方面坚持依法治网，另一方面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针对新技术新业态不断优化治理方式，在保证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为科技企业创新提供了信心和保障。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中再次强调，要

“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坚持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作为奋斗在国家数字安全最前沿的科技创业者，我对此深有感触。

从360在网络空间的攻防实践看，进入数字文明时代后，传统的安全做法已经无法应对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科技创新推动大网络安全格局的构建，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在这样的背景下，360也确立了自己的使命——“上山下海扶助小微”。

“上山”是指上科技高山，坚持科技报国，做网络强国的守护者。近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网络安全的概念已经难以涵盖数字化带来的各种安全新挑战，亟须升级为数字安全。同时，国家级网络攻防对我国发动的数千次网络攻击。我认为，新的历史时期下，科技企业要坚持科技报国，善于开拓创新，勇于担当，敢于亮剑，才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提高我国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大模型技术重构全球数字产业的当

下，大模型推动下的智能化将成为数字化的高峰，同时，AI大模型安全问题也成为世界前沿课题。我认为，实现大模型“安全向善可信可控”发展，将成为我国提升网络空间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也是360坚持攻克的方向。

“下海”则是指下数字化蓝海，赋能产业数字化，做数字中国的建设者。如今，产业数字化已成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中之重，360将通过深化数字安全和大模型安全，帮助企业、政府和城市补齐安全短板，实现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助小微”是指扶助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做数字化“共同富裕”的推动者。360已经为超过120万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免费安全服务，累计检出1800万企业终端木马病毒、3.1亿企业终端漏洞风险，拦截数据库攻击等7000万次，有效保护了中小微企业的数字资产和数字化转型成果，真正做到数字安全“一个都不能少”。

未来，360将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践行新的发展理念，同时一以贯之地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聚焦数字安全，坚持磨砺核心技术，冲在网络空间第一线，不断探索数字安全的“中国方案”，为网络强国建设保驾护航！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

# “一院一所一路径”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刘雅煌

今年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更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重构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秩序提出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期，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合作，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努力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创立“一带一路”科学院，冲破西方围堵，提升我国科技话语权。建议在澳门创立“一带一路”科学院，更好整合沿线科研资源，促进沿线国家科技创新与合作；更好谋划“一带一路”未来整体布局和发展，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可以从主体、资金、研究机制到成果应用各环节开展国际合作，切实体现“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彰显我国的文化自信和包容胸怀，提升我国国际形象。

二是设立华商资源配置交易所，按“三向六位一语系”出台投资交易便利化的政策，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三向”是指以澳门为基地的三个资源配置方向，即内地、澳门和海外；“六位”指内地、澳门和海外之间双向互动有效配置资源；“一语系”指葡语系经济体，通过实体经济往来以澳门为枢纽的中国与葡语系区域商贸合作强化。可在国际范围内打破区域利益、资源信息、投融资、体制机制、人才流动等壁垒，推动全球华商资源海外基地的建设，实现华商资源集约优化。建立“政府引导+驻点牵线+协会协调+华商参与+企业运作”的营运模式。由相关部门指导，在澳商贸机构、行业协会和专业团体配合下，成立交易所专项基金和项目

#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促进高质量发展

王冬胜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已从2018年的第78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这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在持续改善，但仍有提升空间。

受地缘政治、全球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一些美西方媒体有意歪曲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甚至利用一些在华投资失败企业宣传来华投资的负面信息，以图对将要来华投资的企业决策进行干扰。在与外资企业及一些驻港机构的交流过程，我们也感受到一些企业对投资中国、投资内地存有一些疑虑。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就是要让各类投资者，尤其是外国企业吃上定心丸，让他们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享受到公平的市场环境，并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目前，全球的投资形势不容乐观，因此，我们要在迈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推动并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更好地打造更加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建议如下：

一是建立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营商体系，夯实营商环境的公平基石。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是发展经济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吸引外资的现实需求。因此，要尽快完善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经营体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促进各类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

争和享受各类政策待遇，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执法行为，避免为招商而制定的优惠政策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各种风险隐患。

二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展示良好营商环境。要多层次建立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宣讲、解读相关政策，了解各国投资者的诉求，以减少误解，纠正错判。同时相关政府及监管部门要定期、不定期进行新闻发布，及时与投资者进行直接沟通，尤其在由于政策调整而出现市场不稳定迹象时，更要及时向市场传递清晰的官方声音，以快速稳定市场情绪，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三是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行政服务的意识和水平。地方政府应在高标准上厘清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坚持并完善“一条龙”服务机制，简化外商投资各个环节的办事程序。树立既重招商，又能稳商的政府服务标杆，发挥示范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总体行政服务水平。同时，提倡“有求必应，无事勿扰”的服务理念，让外资企业感到实质性的投资便利及对其利益的合法保护。

四是建立政府招商综合评价体系。对标国际，结合国情，建立高质量发展招商引资评价体系，将审批流程、审批事项、办事时效、服务标准等指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

# 上半年居民信贷保持多增成为金融数据亮点

本报记者 李元丽

7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3年上半年主要金融数据。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1.55万亿元，同比多增4754亿元。其中，6月份社融增量为4.22万亿元，超出市场预期(3.21万亿元)。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人民币贷款是新增社融同比保持多增的主要支撑因素。从信贷类资金看，新增人民币贷款15.6万亿元，同比多增1.99万亿元。从直接融资看，企业债券净融资1.17万亿元，同比减少7883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3.38万亿元，同比减少1.27万亿元。企业债券少增与2022年11月以来债券市场波动加大导致债市融资成本上升，以及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对债券形成替代有关。政府债券少增与去年专项债券集中于上半年发行有关。从表外融资看，委托贷款增加743亿元，同比多增797亿元，信贷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分别多增3980亿元、2619亿元，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稳步增强。

“二季度以来M2增速稳步下降。”在梁斯看来，6月末M2同比增速为11.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0.1个百分点，呈稳步下降态势。M2同比增速走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银行信贷投放放缓，带动存款规模下降。二季度以来，企业融资需求有所转弱，信贷投放放缓带动存款下降。二是居民消费意愿增

强。2023年以来，受疫情政策放开影响，消费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居民消费动力稳步回暖，储蓄意愿有所下降。特别是居民外出购物、就餐、旅游、观影活动增加，相关消费明显扩大。

此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保持多增，居民信贷需求稳步转暖。从居民部门看，短、中长期贷款多增7091亿元、少增1000亿元，短期贷款5、6月出现连续多增，说明居民消费热情有所转暖。2023年6月，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成交套数为1239.82万平方米、10.84万套，同比下跌33%和33.9%，结束了此前连续多增的态势，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探底阶段，尚未出现企稳迹象。从企业部门看，企(事)业单位新增贷款12.81万亿元，同比多增1.41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9.71万亿元，同比多增3.49万亿元，持续延续多增态势。年初以来，企业中长期信贷需求连续保持多增，但自二季度以来增幅出现连续下降，6月同比多增1436亿元，为今年最低。

“进入二季度以来，随着经济恢复放缓，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高歌猛进’的情况有所减弱，但在消费需求转暖带动下，居民信贷表现相对较好，而企业中长期信贷保持持续多增意味着对经济预期整体仍然保持乐观。展望下半年，随着政策加力提效及经济内生动力修复，金融数据有望稳步走强。”梁斯最后说。

# 汽车史的启示

## ——中国经济怎么看之一百二十

杨朝英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模型技术的出现，引发全球产业界高度关注。有人欢呼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认为它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有人担心它带来科技伦理和安全问题，甚至呼吁暂停全球范围内大模型技术的研发。

新技术颠覆传统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强大心理冲击，这是一个客观现象。类似场景，历史上已经上演多次。区别在于，选择不同，带来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全球汽车发展史，就验证了这一点。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也占据了先机。1825年，英国就推出了世界上最早商用的蒸汽动力公共汽车。6年后，美国才有类似的服务。

汽车的出现，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引发极大争议，尤其马车商人对此意见极大。各国政府对此纷纷作出反应，其中英国最为积极。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机动车道路法案》，规定极为苛刻。如，一辆汽车须由3人驾驶，其中一名手持红旗的男子走在汽车前55米处开道，旗手要协助马匹和马车通行，限速每小时6.4公里，等等。

英国的政策打击了国内研发汽车的热情，也把机遇拱手让给了欧洲大陆。1881年，德国人戴姆勒开办了第一家汽车工厂，1885年发明了时速14.4公里、汽油内燃机驱动的四轮汽车。戴姆勒和另一位德国人本茨因此被世人尊为“汽车之父”。后者于1886年11月2日正式获批世界上第一张汽车专利证书。

1896年11月，英国废除了落后的法规，但机遇也就此错过。此后百年，德国、法国、美国组成全球大众汽车市场第一阵营，英国只能在豪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即便20世纪90年代后，亚洲国家在全球汽车市场崛起，英国的地位依然没有变化。

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上的选择，更让我们明白战略决力的重要。1991年国务院《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就明确了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和目标。2000年左右，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产业化初期。30多年间，政策支持从未间断，这才有了今天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的局面。

汽车史告诉我们，当颠覆性新技术出现时，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定拥抱它，用政策和市场的合力，使其为我所用，为民造福。